

From Mass Unrest to Global Governance: Identity Anomie and Its Reconstruction

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

认同的失范与重构

张全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rom Mass Unrest to Global Governance: Identity Anomie and Its Reconstruction

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

认同的失范与重构

张全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 认同的失范与重构/张全义
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61 - 5842 - 5

I. ①从… II. ①张… III. ①群体性—突发事件—公共
管理—研究 ②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053 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8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认同安全：“群体冲突” 研究的非传统安全视角 (代序)

我与张全义博士相识多年，平时常有相互交流与砥砺。他自 2005 年起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以来，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论文。张全义博士是一位能甘坐孤独的“冷板凳”，独守清贫的“理论岛”的学者。特别是近几年，他专心治学，相继完成了几部重要著作，发表了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与时政评论。《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认同的失范与重构》一书是张全义博士在学术探索上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纵览全书，该书的阐述特点有三：

一是强调群体冲突研究的非传统安全视角。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具有全球的性质，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群体冲突转化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凡是引起大规模群体冲突和暴力性的事件，其真实的诱因往往源于多个层面，并往往超越主权国家的既存边界；比如，21 世纪初以来的中东乱局，像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本·阿里政权的倒台或危机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前几年中亚发生的“颜色革命”、泰国的“红黄衫党群体示威”、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事件都与种种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甚至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形成新的国际性冲突，如欧美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博弈便是一例。就我国而言，近 30 年来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也多多少少与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的格局变幻有关。这种复杂场景或新挑战亟须非传统安全研究学者对之作深入的理论剖析与研究。

可喜的是，本书作者能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对群体冲突的政治治理作

深入的理论考察，并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群体冲突作总体性研究。作者能围绕失序的政治生态如何进行政治治理展开深入探讨。在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中东的持续乱局、泰国的政治危机、乌克兰的冲突事件、伊斯兰国的极端行为等问题时，作者分析称：群体冲突的升级不是暴力便是战争，甚至可能持续发酵为国内革命或引发全球性危机或世界级的战争。作者在分析中国的语境基础上指出：“在我国，自 20 世纪末伊始，群体冲突事件似乎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尽管与上述的冲突、暴力在性质上与原因为有所区别，但其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仍值得高度关注。”在研究中，作者观察到我国群体冲突的若干新特征：“冲突的诱因不断泛化，冲突的参与者身份日益多元化，冲突的表征不断趋于暴力或恐怖，并使诸多社会行为体或使动者互相碰撞、会聚并形成巨大的冲击波并给国内的政治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作者认为，这一切不仅使群体冲突与化解成为了政治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也使基于传统体制的政治治理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因而用非传统安全视角对群体冲突的政治治理进行研究尤其重要。

二是强调心理认同失范状态下的认同再建构。人的价值生命是一种特定场域中的关系复合体。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说过：“每一单个的人，一旦他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被置于先他在场的某个人类群体中”，“我们叫做‘心灵’、‘心理’的那个东西，实际上不外是这些联系功能的一种相互关联……相反，人的有机性天生地就在他是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的一部分。”

群体冲突是任何社会在“有序—失序—有序”转换中的重要表征，而深度全球化则给我们的社会转换与治理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引发出以下一连串问题：如果说以往生命安全、利益失却、经济受损是导致群体冲突的一个诱因，那么，在当下物质、福利和安全基本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规模性冲突事件为什么还会接连发生？如果说诱发群体冲突的认同成因与群体潜意识相关联，那么，意见领袖或领头人在群体冲突事件中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冲突群体与领头人之间又是如何互动并在理念上实现共享？如果说勒庞之“乌合之众”理论让我们洞悉了冲突之后的从众心理，那么，如何理解社会组织、国家甚至体系心理对政治治理的挑战？全球化的场景下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媒体失范等又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纵览全书，作者围绕上述问题做了一个大胆尝试，不仅对社会

人、群体之冲突心理形成及其化解进行了讨论，而且在国家与体系心理层面做了探索。

认同是安全的核心变量。心理认同、集体认同、国家认同等并非是空洞或抽象的话语，其生成或转换离不开根植于其中的社会场景。然而，面对群体冲突的政治治理，我们需要进一步发问：阶级/阶层认同、体系/制度认同、文化价值认同本身及其之间如何形塑社会结构？社会认同实现的路径或机理表现在哪些方面？在结构生成上如何形塑了一个阶级或阶层，并如何影响社会制度或体系的转换？全球化场景下阶级或阶层认同发生了哪些变化？阶级认同是否仍将沿袭历史的传统对社会制度的变迁发挥变量性的作用？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非平衡发展是否会催生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虽比较宏大，但与现实紧密相关，是从事社会治理研究所不可逾越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认同生成与转换、失范与建构的维度对上述问题做了梳理与回答。

作者认为，认同建构是政治治理的首选路径，而认同的最终生成又取决于使动者在个体、组织与体系层面的建构。这“建构的建构”的逻辑似乎是作者想给读者指出的政治治理的必然逻辑。然而，群体不合作、群体抗议示威乃至种种过激的群体冲突又似乎打破了这一逻辑的顺利展开，进而使得政治治理出现了难以超越的困境。作者指出，认同失范是政治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心理认同失范是导致从国内到全球治理失序的渊藪”，心理认同与群体冲突、全球治理的关联是人类社会场域联系的主要特征。为此，作者认为对心理认同的范式重构是解决现实政治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路径，这是因为心理认同范式具有以下特征：心理认同生成与其相应的社会场域或场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认同机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认同内核与社会理念和社会价值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认同演化与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机制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认同研究范式与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及多元主义研究范式有着深刻的联系。作者进而得出的结论是：心理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而心理认同研究则已经上升为一门“综合的学科”。

三是强调中国方略与国际体系及世界格局的关联性思考。“位卑未敢忘忧国”，关注天下治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鲜明特征，作者秉承了知识分子的这一自然天性。

全球化场景下的制度改革不仅涉及国内体制，还须考虑国际场景。国内规范与全球规范的融合与嫁接问题已是学界多年探讨的一个议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的综合运用，而领导（leadership）与治理模式本身就是国家实力综合运用的表现。领导作为一种集约的概念，就是引导和激励，是一种感召力、影响力。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深思既存的国际体系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建构，深思中国走向世界时与原有和新建的国际规范之间的衔接与融合。王逸舟教授指出：“全球化场景下，需要一种新思维——一种创造性的介入，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更不是采用极端、激进的方法去摧毁或破坏既有的制度或体系。”社会主义只是人类进步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我们追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基于中国本身的历史、政治进程，同时也不应脱离世界历史和政治的场景。

此外，本书的研究风格也值得一提。观其著，作者浓重的哲学思辨趣味、厚实的历史阐述功底跃然纸上。作者的阐述不仅涉猎了从古希腊哲学家到近代的霍布斯、马基雅维利、黑格尔、马克思，从现代的涂尔干、韦伯、达伦多夫到当代的罗尔斯、李普塞特等人文社会学科巨匠的论说；而且借用了一些历史大家如汤因比、兰德斯、亨廷顿的学说。从书中可知，作者深受社会心理学中认同理论、沟通理论、冲突学中社会立方体理论（social cubism）以及政治学中建构主义理论、世界系统进化理论的启迪。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试图对国内外大师的观点与现实进行嫁接与诠释，试图从人性、政治结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社会正义、社会功能、社会控制等角度分析社会冲突，以期从理念、功能、制度诸角度开具药方并将其运用于社会治理和国家机能的改善。在案例上，作者采用了历史和现实中一些耳熟能详或曾经引起关注的案例，有的还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群体冲突场面。书中也提及了近年来发生在国内的一些重大群体冲突事件。作者领导的研究小组还进行了现场调研、人物采访和网上调查，并有针对性地与一些客体或冲突使动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作者主张对行为体采用综合的、连续的、人性的“工程”（project）或模板（module）疗法，并虑及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媒体议程设定、全球体系的互动等相互制约的因素。作者特别提醒社会治理者将冲突化解当作一门“国家的艺术”，从而促使冲突由消极到积极、由风险到机遇的转换。

当然，本书也有不少在理论上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如作者在分析

社会整体时，仍然沿用“主体—客体”的范畴，甚至把由人组成的社会行为体认定为“客体”，而没有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把握所要分析的行为体。再如作者虽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机制协调思路，但如何在现实层面保证社会组织、国家与全球层面推进这种协调尚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与分析。还如在案例采用上有的案例带有受访人情绪化的特点，其中的一些叙述与推断也难免含有主观的因素等。然而，瑕不掩瑜，我深信张全义博士的新著将会给读者带来重要的启迪，我也衷心祝愿张全义博士在虚心听取读者批评的基础上，“大度看世界，从容做学问”。

余潇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大学生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浙江大学玉泉石流斋

2015年4月20日

目 录

导论	1
上篇 心理认同生成与失范	21
本篇导读	23
第一章 心理学研究文献回顾	25
第二章 心理认同生成的微观因素	36
第三章 意见领袖与群体之间的心理嫁接	44
第四章 心理认同失范	54
相关链接 邻避心理与地域认同效应	63
第五章 影响心理认同转换的社会因素	67
第六章 社会体系中的认同生成与转换	75
本篇结论	91
中篇 认同建构与拐点干预	93
本篇导读	95
第一章 社会心理机制与社会潜意识的形成	97
第二章 认同缺失与社会大拐点的发生	110
第三章 心理抚慰机制的建立	118
第四章 科学示威机制的建立	131
相关链接 机制认同的效用——韩国示威的启示	136
第五章 社会治理与政治认同建构	142
第六章 顶层设计与政治体制改革	150
本篇结论	164

下篇 全球治理中的认同建构·····	165
本篇导读·····	167
第一章 国家心理生成：中国之“和为贵”模式·····	169
第二章 国家心理失范：美国战略东移的假想·····	178
相关链接 中日钓鱼岛纷争与中日战略机遇期碰撞刍议·····	189
第三章 体系心理及其范式·····	193
第四章 体系认同转换：相变原理的启示·····	203
第五章 体系心理干预·····	217
第六章 全球治理与认同的建构·····	223
全篇结语·····	245
参考文献·····	249
重要人名及词目索引·····	270
后记·····	276

导 论

近年来，笔者一直就国家认同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等议题进行思考，并得出初步结论：历史结构、体系演进、社会场景、文化意识及政治治理的效用与集体认同或身份的建构实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认同的最终生成取决于使动者在个体、组织与体系层面的建构。^① 认同建构是政治治理的首选路径，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在治理的意义上含义殊途同归，正如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在对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人们支持的话，好制度也没有太大的价值”。^②

然而，设若理论的奉献让我们认识到了认同对于政治治理的研究意义，政治家、管理者亦不遗余力地在推进治理，而在现实中，为什么遇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

无论承认与否，群体性冲突越来越成为十分抢眼的符号，遑论国内或国外，示威性群体冲突似乎已成为社会生活的“调味品”。打开电视或电脑，在世界各地，几乎每一天都有关于群体性冲突的镜头或消息。示威游行中，那黑压压的人群、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僵持对峙、示威者失去理智或歇斯底里的行为，官员们尴尬的窘态，以及铺天盖地的媒体长枪短炮的镜像直白地告诉我们：群体不合作的社会事实已实

① 张全义：《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② [美] 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插图第10版），夏维勇、杨勇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在在在影响到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与福祉，并对国家治理与国际秩序形成了挑战。

失序的政治生态几乎成为政治紊乱的代名词，其引发的效应往往不可预测，它将波及或威胁到既有的政治秩序与权力安排，遑论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

在此，不妨回首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影响比较大的冲突性事件：

2008—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经济动荡：罢工、罢市、罢购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话题，几乎每天美国都有群体冲突或示威游行发生。

2010年，中东乱局持续发酵：突尼斯、巴林、埃及等国频频爆发群体性冲突事件，导致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使得不少政治大佬或铁腕人物出人意料地提前结束政治生涯甚至沦为囚徒或死亡。尤其是，一度被称为“中东枭雄”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对欧美的“不合作行为”还诱发了战争，并最终导致其本人死于非命。^①其后，叙利亚的国内冲突最终引发了内战，并持续至今。

2011年，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事件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港口罢工事件、进军华盛顿行动曾使得奥巴马政府一筹莫展、穷于应对。

2012年，也是极不平静的一年，暴力、自焚、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分子伤及无辜、袭击基层政府，严重影响到相关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2013年，世界性冲突事件似乎愈演愈烈。从北欧到东欧，瑞典、俄罗斯、克罗地亚，群体冲突不断升温，暴力冲突从农村蔓延至城市中心，骚乱、恐怖袭击触目惊心。

2014年，冲突、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似乎有增无减。从中东、东南亚的泰国、东欧的乌克兰再到北美美国的弗格森骚乱^②，群体性冲突事件所引发的暴力、伤亡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并不断引发政府危机、地缘政

① 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代表希望在地中海区域实现“大地中海计划”，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实施其“中东路线图”，卡扎菲坚持己见，两边都不让步，终使欧美在铲除异己的战略上达成认同。

② 2014年11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晚间决定不起诉8月枪杀非裔少年的警察后，全美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涉及34个州的90座城市；圣路易斯地区经历一夜骚乱，枪声频传，并出现纵火和劫掠事件，截至25日清晨超过80人被警方逮捕。见《美国“弗格森骚乱”波及34州90城超过80人被捕》。（<http://news.sohu.com/20141126/n406387506.shtml>）

治动荡、军事政变，甚而造成国家分裂、动乱。

2015 年伊始，持续的暴力冲突还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上演，尤其是“伊斯兰共和国”（ISIS）极端行为又为本来就动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平添了变数。

打开历史的画卷，冲突、暴力与战争向来波谲云诡，其演化、发酵变得难以预测，而后果往往是殃及普通百姓，造成生灵涂炭，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并最终给人类文明带来劫难。冲突、暴力、战争向来与政治是孪生兄弟。群体冲突的升级不是暴力便是战争，甚而持续发酵为国内革命或引发全球性危机或世界级的战争，今天如此，过去亦如此。20 世纪与 21 世纪的诸多悲惨事实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它足以勾起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1905 年俄国革命直接诱发了俄国国内战争，继后的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与波黑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斗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日、意法西斯的种族至上主义倾向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空前的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大约 1000 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 1500 万，其中犹太民族就有 500 多万人遭到种族灭绝式的杀戮。

在 20 世纪，大约有 1 亿人直接死于由政府支持的、由军事单位组织的集体冲突和暴力。仅 20 世纪 90 年代，高加索地区、前南斯拉夫、塞拉利昂等地区和国家就曾遭遇大规模群体性暴力冲突。1994 年，在卢旺达惨案中，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通过集体暴力制造了一场接近 100 万人的大屠杀。在这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暴力的升级使得参与者几乎成了疯子——乳臭未干的儿童、温良贤恭的妇女竟对自己的邻人和亲友进行疯狂的施暴与砍杀。

让我们将目光再转向 21 世纪初。在震惊中外的“9·11”事件中，3000 多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袭击的目标竟是自称是世界上最民主、最文明、最现代、最进步代表的美国。其后，暴恐的帷幕几乎覆盖了世界上每个地区，从别斯兰到巴厘岛，冲突、暴力、恐怖、战争此起彼伏，它实实在在地殃及人类的生命与安全，其中的一些暴行与杀戮冲撞人类文明的底线。

在我国，自 20 世纪末伊始，群体性冲突事件似乎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尽管与上述冲突、暴力在性质上与原因上有所区别，但其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仍值得高度关注。

1996年以来，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其中松花江污染事故、大连海岸油污染事故、厦门PX项目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群体的规模性参与并导致了群体冲突事件的持续上升。已有的数据表明，2000年以前，由环保问题引起的事件以年均29%的趋势增长，2011年以来却呈三位数趋势增加，2012—2014年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其中尤以什邡钼铜项目、启东排污项目、宁波镇海PX项目、彭州石化、广东茂名芳烃等项目引起的群体冲突抢镜，成为国内外关注且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在201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十面霾伏”现象终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将百姓的“心肺安全”提上日程；2014年，贵州三穗、云南晋宁、湖南平江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发生在我国香港特区的“民主失范”行径更值得我们反思，它不仅影响了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而且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与治理。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冲突不断趋于暴力化、恐怖化，从“7·5”恐怖事件到昆明的暴恐袭击事件，手无寸铁的百姓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虽然发生在我国的一些群体性或暴力事件有些系个体事件，但在全球化的场景下，不可否认，某些事件引发的效应已超越了事件本身，它给国家的安全、稳定及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国，群体冲突还出现了新的特征：冲突的诱因不断泛化，冲突的参与者身份日益多元化，冲突的表征不断趋于暴力或恐怖，并使诸多社会行为体或使动者互相碰撞、会聚并形成巨大冲击波，给国内的政治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不难看出，在政治、经济、信息不断外溢的全球化场景下，人类社会之间的敏感度和脆弱度不断加强，使得个体的、孤立的冲突事件与整个社会连在一起，它们不仅危及个体利益、社会群体福祉，而且直接影响国家、地区关系，甚而引起国际关系紧张与国际体系的动荡，并殃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人类社会已确确实实进入不确定的“风险社会”时代。

冲突是任何社会制度的常象。19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指出，无论是个体意义的人抑或集合意义的人，威权社会还是民主体制，群体始终淤积着冲突的潜质。^①“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必有冲突”，冲突学家达伦多

① [美] 乔恩·埃尔斯特：《政治心理学》，陈秀峰、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53、159—160页。

夫 (Ralf G. Dahrendorf)、克博 (哈罗德·R. 克博) 等也认同这一点。^①

群体冲突与化解已成为政治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政治家、学者、社会治理者须充分认识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换并非仅仅表现为一种时髦、概念性的话语变化。它关乎治理方法、技巧、智慧、理念的提升,并不能停留于浅层 (比如利益补偿),并亟须学者从实践层面进行推进。尤其是,尚需我们对一些现实的或与社会治理有密切关联的问题进行思考或解答。

就冲突生成的理性因素而言,如果说生命安全、利益失却、经济受损是导致群体冲突的重要诱因,那么,在物质、福利和安全基本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规模性冲突事件为什么还会接连发生?诱发群体冲突的潜意识表现在哪些方面?意见领袖或领头人对群体冲突事件中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冲突群体与领头人之间是如何互动并在理念上实现共享?

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有:在国民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额、外汇储备、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乃至人均寿命、营养水平、国民的受教育程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时,为什么还会出现“吃肉骂娘”现象?为什么在话语层面会出现各种各样官员的雷人话语,如“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等等。如果说执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一致,那么,造成这种观念 (认同) 断裂的原因是什么?

一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也值得思考,从普通百姓的“老人倒地不扶”“挟尸要价”到官员的“前腐后继”“塌方式腐败”甚至频发的官员抑郁症式自杀现象等。我们不禁要问,导致这些非正常现象的诱因是什么?

从寻求科学治理的途径看,如果说群体冲突是政治治理中的一种常态,那么,社会治理者如何化解冲突,并引导民众理性对待利益、自尊、身份的失缺?如果说法律赋予民主示威成为一种合法的社会诉求,社会治理职能部门又如何引导民众进行合理的宣泄,进而在机制上进行创新?

^① 达伦多夫指出:“冲突看上去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只要有生活的地方,就会有冲突”;科林斯基也说:“对于冲突理论而言,其最基本的见解是人类是合群的具有冲突倾向的动物。”[美]哈罗德·R. 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第七版),蒋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从提升政府治理的功能看，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台机器，什么位域或条件有可能导致其零部件生锈、移位（错位），造成机器运转失灵甚至瘫痪的原因是什么？就更新换代而言，如何在不损坏主机的前提下进行修补、零件更新？如果国家被视作政治治理中最主要的行为体，那么，保持政治制度进步与执政党生命力的原动力是什么？执政党如何在法律与制度约束下实现国家的创新和发展？

从国内政治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看，一些涉及历史进程或体制变革中的现象也值得关注：冷战结束后，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历史没有终结，苏联式的消亡没有在中国重演？为什么中亚的“颜色革命”以及后来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国家如何从顶层设计出发在理念、制度以及结构层面进行法治建设或制度创新？政府职能部门或者社会治理者如何发挥其“守夜人”（night watchman）或“看门狗”（watchdog）作用，以扭转社会拐点或破坏式的革命发生？

从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层面讲，如果说当下的世界不再是相互分离的世界，国内群体冲突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就复合性治理而言，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群体冲突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为单元体的国家应该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地区利益与全球利益、东方的礼俗社会与西方的法理社会能否以及如何达到有效的融合或衔接？单元体之间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心理？国际社会形形色色的行为体能否就共同的发展达成基本共识或认同？在此意义上，如何发展、壮大和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发展与大国、邻国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上文中所提及的问题林林总总，涉及不少学科、领域、体系或范式，而事无巨细地就它们展开纵论，显然为本书的篇幅所难允，也为笔者的学识与驾驭能力所不及。

然而，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环境等因素密切互动的全球化场景下，我们又不可能对上述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敏感性与脆弱性视而不见。影响群体冲突的变量不再是某个单一的学科或囿于某个特定的场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就理论的实践意义看，学者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观测导致群体冲突的表层现象，或者止步于望梅止渴般的建议；反而，需要从行为体的机理或机制，受体或客体的效用与联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需要对那些影响到行

为体理念认同的结构或机理因素进行挖掘，需要寻找一个切入点或视角，就上述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或阐述。围绕群体冲突与政治治理的关系进行纵论或解读，不仅是建立国内政治认同的需要，也是解决全球治理困境之所需。

“众里寻他千百度”，所以，从心理认同的视域出发，探讨政治治理便成为本书写作的重点或者试图达到的目的。^①

二

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与心理认同向来难分伯仲。人是社会意义的人，人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既具有规律性的理性诉求又兼具感性的心理特征；一如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言，“一切社会的实体都是心理的本质的人造物，它们的社会学的概念必然同时也是心理学的概念”^②。

社会的现实或事实的发生离不开具体的本体、客体与场景及其理念或精神。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它不是简单的累计。个体命运、生活环境、家庭背景、群体心智、职业特征、社会场景、制度特点、文化意识、性别、话语甚至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等因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社会内容、结构与运转方式。

人类的社会是由主体与客体，精神或理念组成的。本体、客体泛指我们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行为体，包括个人、国家、非政府组织、国际体系与其存在的社会场景或体系，而理念或精神则涉及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人类特有的心智、认知或观念。就人的社会属性而言，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大的组织行为体（比如国家甚至体系）多多少少都具有认同或身份的表征，并催化正向或负向心理效应，这是由认同的“同一、

① 原课题主要基于国内群体冲突的诱因与干预机制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冲突的心理诱因与认同已呈互相交错；从使动者的作用看，个体的人、社会组织、国家、国际社会互有影响；从治理内容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并重，因此，才有了“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认同的失范与重构”这个议题。

② [德] 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